焦点 评论

把粟裕墓圈起来赚钱，红色旅游不能这么游

最近，有网友发微博称，自己想要凭吊粟裕将军，但遭索要全景区门票95元，且景区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3月19日凌晨，黄山区新闻办发布情况通报称，谭家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系私人投资建设，为保障运营，开发军博园旅游项目，依规有偿开放。虽然不属于军博园，但粟裕将军墓与纪念馆在同一区域，黄山区将开辟专用通道，方便各界人士瞻仰，同时责令军博园停业整顿。

黄山军博园着实做得一手好生意：粟裕墓是公共资源，可以免费凭吊；而纪念馆是私人开发，参观要收费。但巧的是，要去免费的粟裕墓就要经过收费的纪念馆，所以游客最后还是免不了乖乖掏钱。如此机巧的设计，不得不让人佩服园区的经营“智慧”。甚至说它是敛财有术，一点都不夸张。

黄山军博园运营方吃相难看的一个更直观表现是，当游客对其收费行为进行质疑时，工作人员竟称，“这个地盘就是我的”“我投资了几千万下去，你贡献给我一分钱了？”这不仅是服务态度恶劣，更是浑然把这处红色旅游景区当成了纯粹的私人领地，而事实上，景区有着相当厚重的公益底色。

从2004年国家开始布局红色旅游以来，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兴建了一大批红色旅游景区，人们到红色景区瞻仰先烈，追溯革命历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项精神属性极强的工程，不管红色旅游景区是政府出资建设，还是私人资本打造，赚钱从来不该是唯一驱动。

具体到粟裕墓与其所在的谭家桥抗日纪念馆，都知道，粟裕是开国大将，戎马一生，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在他死后，部将按其遗嘱，将他的骨灰洒落在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一处就是安徽黄山谭家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想和牺牲在这里的战友长眠相伴，永远与这片热土相依。

可以说，谭家桥的粟裕墓，不管是对粟裕本人，还是对中国革命历程，都有着非凡意义。它记录着粟裕将军的人生痕迹，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它绝不属于某个人，更不属于某个企业，以开发周围景区的名义有意无意将其圈起来赚钱，是对粟裕的不敬，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无视。

谭家山粟裕墓的遭际，可能是近年来红色旅游走偏的一个侧影。揆诸当下，一些红色旅游景区盲目经营，在追求外观“高大上”的同时，文化内容却流于娱乐化或庸俗化。去年在河北冉庄地道战遗址景区内，就出现景区为游客提供伪军军服的现象，不仅大煞风景，也玷污了革命精神；而一些地方景区，本来是围绕文物为中心而建，结果文物本身破败不堪，外围的旅游项目却发展得红红火火，让人怀疑这到底是为了纪念先烈，还是为了逐利。

事后补牢值得肯定，只是还有一事需要追问：当时军博园圈占粟裕墓，当地景区管理部门是怎么监管的？如今开辟专用通道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查查背后有没有利益勾结。这，才是彻底杜绝以后此类情况的关键。 □汉卿

热门 话题

动车救人被索医师证：这瓢『凉水』泼不得

“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这则网文记叙了3月17日陈姓医生在由柳州去南宁东的动车上救人的经历。当天，陈医生听到紧急广播后，赶往三车厢救治患者，陈医生在检查患者身体、让其服下药物之后，患者腹痛缓解。

不料，陈医生在返回车厢之时，被乘务员要求出示医师证。陈医生表示未随身携带医师证，乘务员又将其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档，并要求陈医生手写情况说明，留下联系方式。陈医生还发现，在救治过程中，列车工作人员一直在全程录像。

昨天，“南宁客运段”官微发布消息向涉事医生致歉。随后广西卫健委也在其微博上表示，陈医生表现出一位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值得表扬和肯定。根据相关规定，医师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的，不属超范围执业。

客观说，“南宁客运段”的解释也能说得通。但把问题归结到“沟通”上，或许有些避重就轻了。录像、索医师证、拍照存档、让陈医生手写说明、签字画押——这一连串的动作倒是像极了对待“开车违章”的处置程序。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救人者，换成谁恐怕都会觉得“寒心”。

问题在于，“广播找医生”是交通工具上十分常见的做法，具有约定俗成的正当性。列车一面紧急广播寻找医生，一面又对医生救人提出过高的、强人所难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做法。

有一点需要明确，救人与执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执业有限定的地点，但救人不应该有。“执业”必须在特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同时也存在获取报酬等与执业相关的行为。当路遇患者时，医生上前施救纯属做好事，这种行为不应该被当作执业行为来看待。

《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医生即使作为普通民众出场，对他人实施紧急救助时也可以免责，更何况他们具有较高的急救技能。

救人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热情。热情需要全社会的培育，不能“强好人所难”。只有对施救行为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人与人之间才会存在温暖，向突发急病的患者伸出援手，方能成为包括医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 □罗志华

民生 视角

『5+2，白加黑』不值得提倡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居民平均日工作时间较十年前增加近1小时。其中，年轻人每天工作10小时，通勤时间近2小时，甚至休息日也要工作7小时42分钟。报告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热议。不少人感慨，“于我心有戚戚焉”。

身在职场，总会遇到急难险重的活儿，偶尔加班加点在所难免。但放眼望去，披星戴月的“连轴转”似乎成为很多行业的一种常态。一些企业、单位肆无忌惮地宣扬加班文化，推行“狼性管理”“996工作制”，更有甚者，直接喊出“5+2，白加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一些企业、单位将“超负荷”“全年无休”乃至积劳成疾作为先进典型的“闪光点”大加推崇，“积极加班”成了考察工作表现的隐性指标。这一切的一切，已经不再是强调爱岗敬业，“工作第一、休息第二”，而是倡导“只要工作，不要休息”。

休息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法定权利之一。休息日的多寡，某种程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工人日工作时间可达13至16小时，为维护自身权益，改善劳动条件，英、美等国工人进行了顽强抗争，直到20世纪上半叶，“8小时工作制”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1960年明文规定，全国各城市一切单位必须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小礼拜”制，直到1995年“五一”，现行的双休日制度才最终定型，此后又逐渐出现了小长假、“黄金周”、带薪年休假等等，让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进一步增加。可以说，休息多了，既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得益于法治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加班常态化，不仅让很多人感到“身体被掏空”，也透支着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一味做加法却不做减法，还会催生畸形的社会亚文化，滋长形式主义的“秀场”。在这种环境压力下，很多人是“领导不下班，我也不敢走”，或者认为休息时间工作，才能彰显自己的勤奋；节假日、下班后开会，才能表达任务的重要；遇事不下发“通知”“意见”、讲话稿不连篇累牍，“分量”似乎就不够，“重视”就体现不出来。实际上，有数据显示，一个人一周的最佳工作时间是50小时左右，一旦这个数字达到90小时，工作效果和55小时几乎一致。过度加班大搞“疲劳战术”，往往徒劳无功，反而疑似作秀，助长了功利投机的职场风气。

刹住“加班常态化”之风，既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落地，也需要破除以加班为荣的旧思想。而在这方面，指望单位自省有些不现实，更多需要外在力量的倒逼。就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来说，有关部门其实可以做好统筹，从制度上要求领导主动带头休假、尽量少占用职工的法定休息时间、持续打击文山会海等等。当忙则忙，应休则休，才是真正的爱岗敬业。 □姜忠奇

隔屏有耳，大数据时代的心理恐慌

上海《IT时报》称，经过耗时3个多月的调查，发现不止一家外卖平台存在APP麦克风“偷听”情况。通过模拟使用场景，对安卓手机、iPhone和iPad上的两款外卖APP进行多轮测试后发现，谈话提及某种食物后，出现相关推荐的概率高达60%-70%。

这种操作如果成立，那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网友看到“隔屏有耳”的相关报道，会不假思索就选择相信呢？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早就被平台各种搜集隐私、侵犯隐私的做法“套路”多少回了，简直不由得你不信。下载一个APP，一般都会跳出是否允许定位、访问通讯录等提示。而平台获得这些信息，就可以根据机主位置推送附近热门服务和广告，以及利用你的通讯录推广APP，等等。这还是明着来的，此外还有许多暗着来的操作。近来经常被提到的“大数据杀熟”，就是利用用户访问痕迹进行恶意营销的方式。

所以，与其说人们轻信平台窃听通话，不如说在当下许多人都有着隐私被泄露的恐慌。因为泄露已成常态，人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特别是，智能手机日益普及，已成为人们的日常必需品，将个人信息开放给平台也就成了一种“不容拒绝”的选择。既要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捷又要全面保护个人隐私，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关键不在于该不该给平台开放个人权限，而在于平台如何合理、克制地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如何对平台大数据利用进行严格有效监管。

我允许你访问我的位置信息，只是因为要使用你的应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拿我的位置信息乱来，滥用我的个人信息牟利。这是许多平台都没有做好或者根本不想做好的方面。而对于大数据的政府监管，目前也似乎只停留在如何利用和发展的阶段。一些地方现在都设有大数据管理局，这些机构更多在做的是怎样整合大数据资源，发展地方大数据产业。为此，还须进一步从法制和技术两个层面着手，切实有效地对合理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

社会 透析

智能手机是好东西，大数据也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行业，但是这一切不能建立在滥用、侵犯用户隐私的基础上。只有在用户知情的前提下，依据必要、合理、克制原则使用个人信息，一家公司才能走得长远。 □魏英杰

一代敬业的文学编辑

一

偶然在朋友圈看到《山花》老主编何锐先生去世的消息，突然想起了当年《山花》最红火的年代，被称为文学期刊中的“小五朵金花”，我也曾经给这个杂志投过稿，文稿是直接寄给主编何锐的，过了一阵子我收到了何锐先生的退稿信，他的字写得清秀俊美，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

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中学当语文老师，很冒昧地把文稿直接寄给最红火的期刊主编（不知道他每天会收到多少这样的来稿）——这封亲笔写下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发表不发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本身是一种鼓舞。

我从来没见过何锐先生，也再没有联系过，但仿佛他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觉崇敬——的确如此，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纯正文学情怀，通过这些文学期刊的主编，散发出来，如同一缕穿透时间雾霭的亮光，让人感觉到一种英姿勃发的气息。

为此，我要遥遥地向先生鞠一躬，代表我对一个时代的庄重敬意！

二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愣头青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副刊的主编袁鹰先生。过了几周，他竟然收到了袁鹰先生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在信笺上的，这同学兴高采烈地把信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都知道袁鹰先生，当然不是因为他当着《人民日报》的副刊主编，而是因为我们初中时代就在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井岗翠竹》——在那个年代，这算是比较优秀的文章了，虽然它可能带着时代的印记。像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竟然能给一个写作还在起步阶段的大学生亲笔回信，这是怎样的一种敬业和亲和！我因此对这些老作家、老编辑带着亲切感和天然的敬重。

三

在我读高中的时代，我班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小说，他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把文稿寄给我们地区的文学杂志《衮雪》，竟然收到了杂志主编的亲笔回信——这也是我现在担任主编的杂志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华彧先生。

这只是一本地区级的内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复兴大潮中创办的，它却是和当年纯正的文学风气同步成长的。大概在1997年左右，我在中学当教师，我的一篇小说《玻璃店》在《小说选刊》转载，这本杂志的第二任主编王蓬先生看到了，给我写来一封信，也是用软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在信的抬头称我“小村先生”——我当时29岁，和他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这封信令我异常感动。

2002年王蓬先生经过多方协调，把我调进了市文联，担任了这本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他干脆提议我担任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算是实际上的第三任主编。我一直想着他们这一代文学人，不论当作家还是当编辑，都有着一份坦诚与执着、热爱与敬畏，这变成了一种敬业精神，也许这就是过去那三十年文学充满生机活力的主要内因吧。

我当杂志编辑的第一个月，就通过电话跟全市许多作者联系，和他们谈他们的来稿，和他们商量修改……直到现在，我也经常通过微信，和那些可能在大山里某个小学当教师的作者联系，谈谈他们的文字，说说文学的事情。我觉得哪怕继续一点点过去那一代人的精神，也算尽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本分。

四

在我大学时代，痴迷于写诗。我经常投稿的是《飞天》杂志，它有一个金牌栏目“大学生诗苑”——据说后来三十年在诗坛上混的人，几乎都曾经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幸，我的投稿遇到了诗人李老乡先生，他主编这个栏目。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一组诗歌，占了它的头条。去年听到李老乡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难过，就仿佛那个时代的精神随着他们一去不复返了。

至今我和很多编发过我作品的杂志编辑都没见过面，有的保持着联系，有的甚至连通讯方式都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一些已经离世。有一次我写了三篇小说，修改定稿之后就随手寄给《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刘立云先生，我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知道这本杂志多发表军内作者的作品，文稿寄出去就没再管。过了几个月，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过了二十年，杂志主编立云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到汉中来，我才见到他：一起喝茶的时候，我敬他一杯茶，实际上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和逐渐远去的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 □丁小村

■书人书事■

李星谈人生

日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举行隆重表彰，授予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2018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此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来陕调研，也曾到李星家中看望、慰问，赞赏李星先生作为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对陕西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有幸跟随李星先生达八年之久，每周有两天时间和他在一起，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聆听先生关于文学、学问、思想、人生的一些深刻见解。时间一长，耳熏目染使得我也提高了不少，相当于读了一个文学博士。

先前我曾读过李星先生的一篇散文《我的优胜纪略》，那是一篇浓缩了作者多年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的智慧之作，读后使我惊叹不已。此后，先生又应邀在一所高校做了一场题为《与青年学子谈做人》的讲座，我全程陪同。此次讲座再次让我领略到了“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回顾自己这一生，李星先生首先指出，人生之大忌可用十二字来概括。——“利令智昏，得意忘形，文过饰非。”很多人一生栽就栽在这十二个字上。“叩善鸣善，叩仁得仁，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人首先要善，要学为好人，要有良知良能，不能刻毒，不能背后害人。

谈到人生经验，李星先生认为人生需要五种力量。首先是钝感力。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过一本书《钝感力》。所谓钝感力，是指人不要太敏感，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等方面不要过分在意。主体意识和自尊心太强有时候不见得就是好事。人有时候不妨“迟钝”一点。钝感有时虽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印象，但钝感力却是赢得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智慧。

其次是自控力。所谓自控力，就是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情商”。苏东坡在为张良写的《留侯论》中曾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想想，现实中有多少人生悲剧皆因“匹夫受辱，拔剑而起”而酿成。所以，人一定要能自我控制，遇事不要冲动，要理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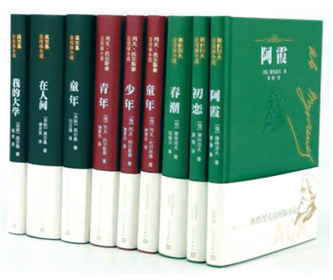
接着是倾听力。大凡那些人生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思想偏狭、封闭，自以为是，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要么，就是活在自我的世界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絮絮叨叨。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倾听别人。倾听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

再就是判断力。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告诫其后人要“高著眼孔、开拓心胸”。也就是要有做大事的眼界与胸襟。干大事就要有判断力，要有事关全局的那种洞察力，不要优柔寡断，更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人生要算大账。

最后是自省力。王阳明先生曾说：“破山贼易，破心中之贼难。”其实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的强大在自己的心灵、境界、精神，而不在宣言、装饰。人是赤裸裸地活在众人面前，所以，人一定要有自省力。要有自知之明，不要逞能，不要自不量力，更不要好高骛远。当然，归根到底人生最重要的还在于你最终要干出一番让别人服气你的事情。也就是在事业上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所以，人还得读书，还得埋头钻研专业业务。否则，即使你再好也只能成为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滥好人”。

如今李星先生已是七十四岁高龄，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正是人成熟、笔老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生“金秋时节”，让我们衷心地祝愿先生韶华永驻、笔力苍劲。 □史飞翔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自传体小说纪念版



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自传体作品——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春潮》，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经典文学作品出版中具有独特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共向中国读者推介了15部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已经成为俄罗斯现象级作家的维克托·佩列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肖丽媛介绍，此次推出的这三套自传体小说，不仅仅是因为适逢他们的诞辰纪念，更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既体现了本人的人格，又书写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既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

据悉，这套纪念版在国内首次集中展现俄罗斯原版图书封面。书中，屠格涅夫自传体小说系列采用了苏联著名画家克塞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克列门吉耶娃的作品。这位苏联著名古典文学名著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创作插图，其作品被俄罗斯多家国立和私人博物馆收藏。列夫·托尔斯泰自传体小说系列采用了苏联著名画家尤里·索罗蒙诺维奇·格尔什科维奇的作品，他的部分世界文学名著插图被俄罗斯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艺术博物馆收藏。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系列则采用了苏联著名画家鲍利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杰赫杰廖夫的作品。 □任敏

《故乡的云》出版 周养俊第五本诗集

本报讯（世湘）近日，陕西职工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周养俊的第五本诗集《故乡的云》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故乡的云》收录诗人周养俊近年诗作120首，分少年梦、故乡云、春天里、山高水长四部分，内容多是诗人对少年时期、学生时代的回忆，对故乡的缅怀，对乡情、亲情、友情的吟唱，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歌颂，文字干净纯粹，语言朴实自然，感情热烈奔放，富有满满的正能量。

周养俊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并出版有长篇小说，诗歌是周养俊创作的一个品种，其诗作得到了许多文学大家的肯定和称赞。著名诗人柯蓝觉得：“周养俊的诗歌开朗、明快，充满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也朗朗上口，写作中没有过分雕琢的痕迹。显得成熟而自然。”

■新书讯■